

位置与身份:左翼鲁迅的意义

曹清华*

〔摘要〕 左翼鲁迅通过写作回答了“吾谁与共”、“吾谁与归”这两个有关位置与身份的难题。鲁迅认为前者是“革新”的理想把“作为表达者的个人”与“作为表达的对象/表达的接受者的大众”连接了起来,而且二者之间是平等的——一个拥有表达的权力,获得了表达空间的“表达者”,应当视处于“表达的困境”中的表达对象为自己的同类。对于后者,鲁迅认同呆子、愚人、无产者。在这一类人物身上,他寄托自己的历史的理想。在鲁迅的笔下,呆子、傻子与无产者相通地方,不是社会道德地位,而是他们为内心所驱使的果断而真诚的行动以及他们远离“知识”,做到了言与行的一致。

〔关键词〕 鲁迅;左翼;位置;身份

我们常见的“文学划分”的手段是时间和地域。这两者多少有些客观的色彩——文学表达的制造、传播与接受总是在某一确切的时空范围内完成。所以才有了诸如“中国现代文学”、“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不容易被人质疑的说法。亦有作家、评论者甚至研究者从位置与身份的角度区别文学,这便有了文学上的“左翼”^①——文学表达者对社会进行划分(上等人/下等人、资本家/无产者、压迫者/被压迫者等等),并由此申明自己的位置与身份,试图以写作来回答“吾谁与共”、“吾谁与归”的难题。

左翼的位置与身份对于“文学”意味着什么?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不少“文学表达者”给出了答案,研究领域的著述更是层出不穷。大多的论述倾向于在表达者个人与某一想象的社会群体之间建立意义联系,以界定和申明其位置与身份。在事实上,这一基于想象的意义关联常常流于空洞、浮泛、漂移不定。而且,位置与身份的声张本身也是一类表达,其与文学表达之间并无切实的制约关系。更重要的是,作为表达的一种的文学,表达本身亦是其解剖、反思甚至批判的对象。“表达者”的位置和身份,与“表达”以及作为其解剖与反思对象的“表达行为”,到底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关联?这后者的微妙之处尚未得到研究界细致的梳理。那么,以鲁迅“位置与身份的申明”与“文学写作”合二为一作为研究的对象,鲁迅的左翼的位置与身份的选择以何种方式表现在他的(文学)表达里面?左翼鲁迅的位置与身份实践对于他自己的文学表达,特别是他在写作中对“表达行为”的解剖与反思,

*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518060。

①强调“位置”与“身份”的大约是左翼。右翼不愿论及自己的位置与身份,他们往往声称自己站在居中的位置,代表全人类。与鲁迅打笔仗的梁实秋便是很好的例。

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对后来者当有何种启示意义？

一、吾谁与共

1934年，鲁迅发表《门外文谈》一文参与大众语的讨论。文中论及作为“智识者”/表达者的位置——

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①

这里所说的“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便是鲁迅对于自己作为表达者的位置的选择，也是他对“吾谁与共”这一难题的回答。这一说法与鲁迅1929年与韦素园讨论“革命与恋爱”的关系时所说——“革命的爱在大众”^②——是相通的。很显然，在鲁迅那里，一方面，“改革”、“革新”的理想把“作为表达者的个人”与“作为表达的对象/表达的接受者的大众”连接了起来。革新者/表达者必着眼于大众。看到并写出为常人所视而不见的“大众”是志于革新的表达者的宗旨。1931年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所说——“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③——声张的也是这一面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表达者的个人”与“作为被表达者”以及“表达的接受者”的“大众”之间是平等的，连接他们的桥梁是“爱”^④。

分析鲁迅贯彻在写作中的位置选择——“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阿Q正传》是最好的例子。众所周知，“阿Q”是“位置”产物。前无古人，所以古书里难以找到为阿Q立传的文体；后亦少见来者，“革命文学家”早就宣称“阿Q时代”已经远去。阿Q是被忽视的“大众”中的一员，换个说法，阿Q们沉积于社会的“底层”，而且恐怕没有人比阿Q更“底层”的了。“觉悟的智识者”鲁迅看到了阿Q，力图把他再现出来，所谓“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与此同时，鲁迅又以自己“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作为表达者，他与作为表达对象的阿Q有着平等的位置。正因此，鲁迅写阿Q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关注作为底层的大众的阿Q的焦点不在其经济与社会地位，而在他的表达的权力、方式及传播渠道。鲁迅作为“表达者”的个人，在面对被表达的“大众”阿Q时，便主要描述了阿Q作为“表达者”的这一侧面。在《阿Q正传》中，赵太爷让“阿Q不开口”，“闲人”们同样要堵阿Q的嘴。（未庄的人们，只拿他玩笑。）阿Q们表达的通道被无形的和有形的手所封堵，表达的自由与权利无从获得养护和培育。然而，阿Q表达的欲望却在顽强的生长、积聚，也一直在寻找着机会和场合，以发出一己的声音来。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我以为“精神胜利法”是一类特别的表达。其“胜利”的“表达”没有接受者，其意义和效力所作用的对象是表达的发出者自己——阿Q大多时候，回缩到了个人的心理空间里头，驰骋其“表达”的“胜利”的愉悦。阿Q偶尔向外界发出声来，要么遭到奚落、嘲笑，以至其表达的“胜利”色彩被扭曲；要么便是向更弱者的放肆和施虐。

鲁迅在小说结尾还写到“阿Q作为表达者”的“苦”。在示众的途中，于生命的尽头，阿Q首先是“说”——无师自通的“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句子只说了一半，便听到了人丛里发出的“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在这一片喝彩声中，阿Q转而去“看”那喝彩的人们。他看到的是人，这“人”

^①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02页。

^②鲁迅：《290407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63页。

^③鲁迅：《310204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7页。

^④即鲁迅所说“创作总根于爱”。见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32页。

却旋风似的把他引导到了对于“物”的回忆中——阿 Q 想起四年之前,在山脚下所看见的一只饿狼。这只饿狼一直不近不远地跟着他,要吃他的肉。而阿 Q 记忆中最不能忘记的是那狼的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然而,阿 Q 所看到的现实中看客的眼睛却更其可怕。这眼睛不但“又钝又锋利”,而且对他的“说”构成了威胁——这眼睛开始“咀嚼了他的话”——阻止了他最后的表达的可能。也正是从“咀嚼了他的话”开始,才进而咀嚼他的灵魂。

事实上,祥林嫂也是这样一类人物的代表。小说里面,祥林嫂是有一个“日夜不忘的故事”要当街表达的。这个故事是她的内心里的“苦”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表达渠道。鲁迅在他的小说里重复两大段几乎相同的文字,让祥林嫂诉说她的“我真傻”的故事,其用意大概就在这里。一开始,祥林嫂“我真傻”的表达不但拥有接受者,并且能够进行有效的意义生产——听故事的人或者陪出眼泪,或者叹息一番,有甚者还要评论着离去。但是不出几天,祥林嫂这一唯一的表达渠道就遭到了封堵——人们不再愿意担当她的表达的接受者,他们通过模仿和戏拟她的故事,让她的诉苦变得荒唐可笑,以至失去意义生产的可能。不仅如此,听者还报以“又冷又尖”笑影,使她本来就十分微弱的表达的意志力被彻底摧毁,以至觉得“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接下来小说写到她与柳妈的交谈,这次交谈一传开去,祥林嫂不但自己不再开口,对于别人的问话也不再回答——“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待捐了门槛以后,鲁迅用来比喻闰土的“木偶人”一词又出现在这部小说里——“(她)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鲁迅如此细致的描写祥林嫂精神状态的演变,展现的正是《故乡》里面所描述的“四面的看不见的高墙”,向祥林嫂不断加剧地迫压与合围。祥林嫂的内心因此而走向枯寂,其最基本的表达的权力以不同于阿 Q 的方式被践踏与剥夺。

孔乙己更是如此。孔乙己读过书认识字。照理,他是掌握了表达工具,拥有更开阔的表达空间和渠道的人物。然而“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社会晋升之“墙”把他隔在统治者的地位与威严之外。在孔乙己的口中,统治者/上流社会的表达工具的尊严性和神秘性因此而荡然无存。不仅如此,孔乙己的语言世界和身份想象与他实际的处境的错位,更使他失去了与下层民众交流的平等地位。正因此,孔乙己内心里的“苦”,在语言的表达,要么是“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一类的上层社会的通俗的谎话,要么是难懂的“之乎者也”之类的读书人的暗语,于这表达的接受者——咸亨酒店的“所有的喝酒的人”——产生的“意义”,惟有“哄笑”与店内外“快活的空气”。

鲁迅以这种方式回答“我谁与共”的难题——一个获得了表达空间的“表达者”关注着处于表达的困境中的同类。鲁迅在揭示这同类的表达的“病”的同时,感同身受与再现了其表达的“苦”。

二、吾谁与归

1926 年鲁迅在《写在〈坟〉后面》说,“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1932 年,鲁迅为《二心集》写序,又说,“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鲁迅认同愚人、无产者,在这一类人物身上,他寄托自己的历史的理想,找到了回答“吾谁与归”这一亘古难题的答案。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是,鲁迅眼中“愚人”、“无产者”的身份想象意味着什么?在鲁迅的笔下她们有着怎样的表现?

我从鲁迅的《一件小事》讲起。这篇小说一直遭人诟病^①。1932年鲁迅编自选集,收了《呐喊》里面的五篇,其中偏偏有《一件小事》。这篇小说选入了中学课本,我们先看读中学时老师便要求背诵的这篇小说的最末一段——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在两年后的另一篇文章的结尾,鲁迅又写下了语气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一段话——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②

在这两段文字里头,鲁迅均表达了因一位平民而生长的“希望”。前者是小说中虚构的“车夫”,后者则记叙了一个制糖公司的“伙计”。这“希望”的得以增长,不在“言”(表达)——前者所谓“文治武力”“子曰诗云”,后者的“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而在于“行”(行动)——车夫的“毫不踌躇”地搀着摔倒的“老女人”的臂膊,“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伙计之“赶紧掣回手去”,并露出“惭愧”的神情。而且,从这果断的行动中,见出的是他们的不狡辩、不掩饰的质朴的内心,同时反衬出“我”的伪装、多疑、自私的伶俐面孔来。事实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傻子”也可以归入车夫、伙计这一类。与“聪明人”的语言表达的敷衍、逢圆、矫情相对照,傻子是直率的态度和果敢的行动者——他大骂“混账”,并动手砸墙。而且傻子不顾奴才的反对和暗示,一味的砸,一味的行动,以至被奴才奉为“强盗”,最终为一群奴才赶走。

在鲁迅的笔下,这“傻子”与“车夫”、“伙计”的相通的地方,不是社会地位,而是他们为内心所驱使的果断而真诚的行动,以及他们远离“知识”,做到了言(表达)与行(行动)的一致。1931年,鲁迅揭示当时自诩的“智识劳动者”的真面目,立为参照的就是这“没有‘智识’的体力劳动者”——“你们再替这些高贵的‘智识劳动者’起来干一回罢!给他们仍旧可以坐在房里‘劳动’他们那高贵的‘智识’。即使失败,失败的也不过是‘体力’,‘智识’还在着的!”^③

这一类人物的出现在鲁迅的想象的世界里,可以上溯到1913年发表的小说《怀旧》和1919年在《国民公报》“新文艺栏”刊出的散文诗系列《自言自语》。《怀旧》以孩童“我”为视点——在“我”的眼中,“我”家的老仆“王翁”和“李媪”,与饱读诗书的“芜市第一智者秃先生”和行止猥琐的守财奴“耀宗”形成了一组鲜明的对照——“王翁”、“李媪”与“我”,不读书,或不喜读书,所以思虑不如秃先生之细密,亦不得秃先生的处世智慧;与识书的秃先生之礼敬优遇“耀宗”不同,王翁李媪爱“我”而傲对耀宗,不屑与耀宗交谈;王翁与李媪的故事给“我”带来快乐,而秃先生的书斋说教和《论语》讲诵,却违背儿童天性,令人憎恶。^④

《自言自语》的“序”里面则有一位“陶老头子”。这位“陶老头子”天天独坐着,因为“一世没有进过城,见识有限,无天可谈”;再加上“眼花耳聋,问七答八,说三话四”,所以很惹人讨厌,也没人理他。只好“自言自语”一世。作者强调,《自言自语》一文所记录的就是其中几句“略有意思的段落”。这些段落所描述的主题和意象几乎都重现于日后鲁迅写成的《野草》和《朝花夕拾》的篇章里面。譬如

^①举远近的几个例子。成仿吾认为这篇作品不能被看作小说,就是称其为随笔也很拙劣。见成仿吾《〈呐喊〉评论》,《成仿吾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8页;夏志清指摘鲁迅的数篇小说“逃不了伤感的说教”,其中《一件小事》排在首位。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页;王朔把《一件小事》列入鲁迅“最另类”的三篇小说之一,说“从立意到行文都很容易被小学生模仿”。见王朔:《我看鲁迅》,载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②鲁迅:《无题》,《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85页。

^③鲁迅:《“智识劳动者”万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59页。

^④鲁迅:《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七卷,第215—222页。

“古城”一节,所讲述的无非鲁迅一再遣用的“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比喻。其主人公“少年”便是一位“拼了死命”的行动者——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支起了逃生的闸门,要把“孩子”挤出濒临被黄沙掩埋的“古城”去。而叙述者“陶老头子”无疑就是鲁迅理想中的人物。

正如“车夫”和“伙计”的行动和质朴的品格,增长了鲁迅的对于人类的希望一般,鲁迅寄托自己的社会和历史的理想,于“傻子”、“愚人”和“陶老头子”这一类人物身上。^① 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有“聪明人”和“呆子”两个专节。厨川白村氏给“呆子”做了以下一番描述——

所谓呆子者,其真解,就是踢开利害的打算,专凭不伪不饰的自己的本心而动的人;是决不能姑且妥协,姑且敷衍,就算完事的人。是本质底地,彻底底地,第一义底地来思索事物,而能将这实现于自己的生活的人。是在炎炎地烧着的烈火似的内部生命的火焰里,常常加添新柴,而不怠于自我的充实的人。从聪明人的眼睛看来,也可以见得愚蠢罢,也可以当作任性罢。单以为无可磋商的古怪东西还算好,也会被用 auto da-fe 的火来烧杀,也会象尼采(F. Nietzsche)一样给关进疯人院。这就因为他们是改造的人,是反抗的人,是先觉的人的缘故。是为人类而战斗的 Prometheus 的缘故。是见得是极其危险的恶党了的缘故。是因为没有在因袭和偶像之前,将七曲的膝,折成八曲的智慧的缘故。而这也就是预言者之所以为预言者,大思想家之所以为思想家;而且委实也是伟大的呆子之所以为伟大的呆子的缘故。^②

厨川白村认为,思想活动和实行运动是内生命的跃进和充实的结果。而这些“动作”要么出于极端地文化进步了的民族,要么就出于极端地带着野性的村野的国民。两个极端,前者的代表是传递着拉丁文明的法兰西人。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人常是世界的新思潮新倾向的主动者,指导者。而后者则非俄罗斯莫属。因为这个斯拉夫人种,有真的文化以来不过百年,是文明世界里真确的田夫野人。这个国度里的村民,在西欧诸国的思潮启发和诱导下,发挥出了村民的真象村民,呆子的真象呆子的特色,产生了许多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类的有着“呆气力”人物。而且,人类发展到现今这地步,就是因为有许多呆子之大者拼了命给做事的缘故。

厨川批评自己的国民为村绅——既非都人,亦非村人,介乎两者之间。其性格,既无都人的高雅,也没有纯村民的热性和活气力,凡事都中途半道敷衍,没有内生活的充实,也没有深的反省,也没有思索。厨村认为,正如此,日本人,无论男女,都没有西洋人所有的那种活泼丰饶的表情之美,都宛若蜜蜡做的假面具一般。也因此,日本没有真的宗教,没有真的哲学;无法产生震动世界的大的思想、哲学、宗教;也无法给与人类永远幸福的大发明,大发现。厨川甚至批评日本人的“没有深的思想生活”,导致了日本语的不适于演说,日本的少有雄辩家,日本学校的鲜有发表思想的演说的科目。厨川进而认可其国民“乐天洒脱,淡泊萧洒,纤丽巧致”的国民性。而这国民性的改造于新时代的人们是一个迫切的任务,而这改造的第一步,便是“再多读些”,“再多吃些”,“再多说些”,“并且成了更呆更呆的呆子,深深地思索去。”^③

对于“呆子”与“愚人”的思考,鲁迅与厨川氏心心相通。在《出了象牙之塔》的中译本的译者后记中,鲁迅直言,著者厨川在书中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在说中国。^④ 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框架内,鲁迅沿用“无产者”一词,并提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一为人所熟知的论断。与“愚人”与“聪明人”的比照相一致,鲁迅笔下的“无产者”对比

^①而这一类人物着实串起了鲁迅创作中的一条红线。其他诸如《补天》(1922)里的“女娲”,《这样的战士》(1925)里面的“这样的战士”,《铸剑》(1927)中的“黑色人”,《理水》(1935)里头的“大禹”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②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鲁迅译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32页。

^③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文集》第三卷,第128—158页。

^④鲁迅:《译者后记》,《鲁迅译文集》第三卷,第285页。

的是他为自己所拟定的?“中产的智识阶级”的身份。在这同一篇文章中,鲁迅一再声明他无意于证明自己就是无产者,相反他认为自己流露于写作中的各种抱怨——“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只是出于“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而且,他原先便“憎恶”于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这一阶级的溃灭。^①

1933年大年初一,上海《东方杂志》征答“新年的梦想”。鲁迅写成《听说梦》一文,供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身份,亦揭露同为一阶级的智识分子的言与行的错位。因为一面是“言”,即智识分子的“说梦”,而且是“载道”的梦——梦“大家有饭吃”,梦“无阶级社会”,梦“大同世界”,等等;一面却是“行”——“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所以鲁迅以为,这“梦”,事实上是醒着的时候做的,“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其“梦中贴标语,喊口号”的行为,也谈不上“载道”,而是被“道载”——“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鲁迅声言,那些和自己同属“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不必掩饰被“道载”的现实处境。^②

1935年在给萧军的信中,鲁迅又称自己“破落户子弟”,而且,正因为这样的出身,才让他明白了许多事情,明白了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的自鸣风雅的底细。也因此,对这些人的解剖便有力,让人觉得好像一个“战士”了,而实际上,只是一个破落户,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相反,高尔基是伟大的,他不能比。^③

那么,在鲁迅的理想和思考中,“无产者”该有着怎样的模样?

首先,无产者乃行动者和“战斗者”。鲁迅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解答沙汀、艾芜有关作家立场的疑惑,更为明确地勾勒了他思想中的“无产者”形象的“战斗”的一面:“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④鲁迅的上述论断,也与这一时期鲁迅的译著中有关“无产阶级”的论述相呼应。譬如,翻译卢那卡尔斯的《文艺与批评》,鲁迅则选了日本人尾濑敬止所作《为批评家的卢那卡尔斯》为译著的序言。这篇短文是鲁迅从尾濑敬止的《革命露西亚的艺术》一书中节译出来的。^⑤ 尾濑敬止在他的文章里介绍卢氏的思想,说卢那卡尔斯的不满于现有的文明,是因为这文明中,虽然有着或种美丽,优柔和味道,但已经毫无可以称为反抗心的东西,所以是凝结的无从进步的文明;卢氏基于这个原因而主张社会主义的必要,但是,他的社会主义与众不同,他以社会主义乃是“从奴隶到自由的过渡”,而非“要得到了使自己满足的自由”;因此,卢那卡尔斯认为,唯有无产阶级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即所谓“在抱着这样看法的社会主义的旗印下,专凭战斗,以赢得美好的未来。进向这永久底,悲剧底且是人道主义底的战斗者,是无产阶级”。^⑥ 又如鲁迅译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对于新兴的“无产者”也有如下的评判——“新俄的人物的特色,是铁一般的意力和不可抑制的元气。那行动,是果决而敏捷,不许长在怀疑底的状态中”。^⑦

其次,无产者将开口、表达,创造新的文化。1930年与梁实秋讨论文学的阶级性,鲁迅便指出,“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⑧ 1931年鲁迅撰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以“无产阶级”为“民族主义”者的对立面,坚信前者将“开口”/

①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91页。

②鲁迅:《听说梦》,《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68—469页。

③鲁迅:《350824致萧军》,《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196页。

④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67页。

⑤在译者附记中,鲁迅说,自己既无力写序来介绍卢氏的生平和思想,只好用别人的文章的代替。

⑥尾濑敬止:《为批评家的卢那卡尔斯》,《鲁迅译文集》第六卷,第147页。

⑦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鲁迅译文集》第五卷,第379、383页。

⑧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03页。

表达,以致“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而批判后者只不过这之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的集合——在“民族主义”大旗下,用了各种美名来掩饰,用一切手段压迫无产阶级,以求苟延残喘。

增加了鲁迅的希望与“勇气”的,是鲁迅眼中的不妥协,不敷衍,踢开利害的打算,专凭不伪不饰的自己的本心而动的呆子、傻子、愚人、无产者这一类人物。这便是左翼身份认同对于鲁迅的意义。

三、结语

鲁迅是左翼文学的一面旗帜。事实上,鲁迅的位置与身份的实践亦是近百年来左翼文学的理想。左翼鲁迅的意义在于,他通过写作,梳理了左翼的“位置和身份的实践”,与作为文学写作的解剖与反思对象的“表达行为”之间的微妙关联。这既值得研究者重视,也对后来的写作者不无启示意义。

回答“吾谁与共”这一位置难题,鲁迅没有停留于口号与标签式的位置申张与演绎。他以为,一方面,“革新”的理想把“作为表达者的个人”与“作为表达的对象/表达的接受者的大众”连接了起来。革新者/表达者必着眼于大众——看到并写出为常人所视而不见的“大众”是志于革新的表达者的宗旨。另一方面,“作为表达者的个人”与“作为被表达者”以及“表达的接受者”的“大众”之间是平等的,连接他们的桥梁是“爱”——一个拥有表达的权力,获得了表达空间的“表达者”,应当以处于“表达的困境”中的表达对象为自己的同类,“表达者”揭示这同类的表达的“病”的同时,亦当感同身受并再现其表达的“苦”。

鲁迅认同呆子、愚人、无产者。在这一类人物身上,他寄托自己的历史的理想,找到了回答“吾谁与归”这一亘古难题的答案。在鲁迅的笔下,呆子、傻子与无产者相通的地方,不是社会道德地位,而是他们为内心所驱使的果断而真诚的行动以及他们远离“知识”,做到了言与行的一致。不妥协,不敷衍,踢开利害的打算,专凭不伪不饰的自己的本心而动的呆子、傻子、愚人、无产者的人物系列,既是鲁迅的身份理想,亦展示了鲁迅文学写作中对表达行为的反思与批判的一个重要侧面。

(责任编辑:陆 林)

Position and Identity: The Meaning of Leftist Lu Xun

CAO Qing-hu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writing, the leftist Lu Xun had answered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with whom I should stand together” and “with whom I should go toward the future”. These two issu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n individual’s choice of social position and identity. As to the former, Lu Xun argued, it is the aspiration for change that links the individual maker of representation with the masses as the receiver of representation or as the represented objects. What is more, both sides are equal to each other: a maker of representation, who has obtained the power and place to voice his representation, should regard as his peers the represented objects who are always in the adverse conditions for making representation. As to the latter question, Lu Xun identified with idiots, fools and the proletariat, for he bore the same social ideals as people of this kind. In Lu Xun’s writings, what these people share is not their social and moral positions but their resolution to act under the push from their inner will and the fact that their word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ir actions.

Key words: Lu Xun; leftist; position; identity